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地方视域的文学研究,往往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叙述并行不悖。从“中心”到“地方”的影响传递与传播路径,构成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思路。40余年过去了,越来越多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学史实不断引发我们思考,新文化和新文学从“中心”到“地方”的传播并非是单向的。新时代的文学研究者应该下沉到“地方”的具体历史现场中去,重新反思丰富而复杂的“地方路径”何以通达“现代中国”。而以不同地域命名的批评家群体和流派,也可以视为当代文学地方性研究的一个具体体现。

——编者

从地方意识、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

□李怡 禾联

禾联:在中国文学史上,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不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地域性都以其特有的文学书写和文学表达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图景。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

李怡:中国人很早就具有了区域意识,甚至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从一开始就同时伴随着对区域的自觉认识。《尚书·禹贡》是以区域地理的视野描述着中国的形态,《史记》有言“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历代史书也都设有“地理志”,记录下了源远流长的区域景观。中国古代文学素有南北之别,因朝代更迭、文化流变,在各地各时有着不同的体现。

至现当代,伴随着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自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区域差异,这些最终又都在文学中被传达了出来。如果说,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我觉得可以说是经由了文化和文学的创造主体——人——而形成的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文化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特色;另一方面,文学发展的特色最终构成了文化的特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抽象的文化与抽象的文学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一切都必须经过人的创造、选择。失去了对人的考察和分析,任何谈论文化如何影响文学的理论都难脱“决定论”的嫌疑,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禾联:文学书写既要关注地域,也要观照整体,不同区域、不同作家的文学书写展现了地域作家各有差异的具体“路径”,正是不同路径的对话和并进才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地域书写的价值和贡献?

李怡:地域书写几乎具有天然的价值,因为这里就是每一位作家具体而微的生存环境,是他认知世界和人生的背景,是他提取世界观与生活感受的最重要的基础。在根本上说,一个作家并没有生活在

抽象的“中国”或“民族”之中,他关于国家民族的感受和概念首先是从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家的中国性和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区域性经验。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其实就是不同区域的个性的整合,这个整合是一个有机体自然“化合”的结果,而不是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先有庞大的“中国性”“中华性”,然后这些“共性”落实到不同的地方、区域,最后产生了区域性。事实恰恰可能是反过来的。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即区域文学研究主要还是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形成的学术范式,应当说在那时我们对于区域研究的理解和思考还是有局限的。表现出来就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中来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并且不时将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置放在西学东渐的模式之中,先考察西方文化和文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然后经过核心城市的“转口贸易”才逐渐向其他内地城市发展、渗透。

这样很容易形成一种“大中国”的现代性“落实”为地方的印象,或者说,地方的现代性不过就是“大中国”现代性(其实是少数“先进”城市的所谓现代性)的某种程度的领悟和呈现,这样一来,地方、区域的主体性就被压抑了,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的主体性就被忽略了。最近几年,我提出对“地方路径”的研究,这不是对区域文化研究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对一个动态的现代化走向的关注,重新提醒研究者注意主体性、创造性和选择性,地方路径不是简单的研究地方文学,而是观察和描述地方文学的现代化运动方式,这是试图推进过去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研究的一种努力。

禾联:地方书写路径的研究能够丰富现当代文学的面貌与图景,探讨地方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联性,并将这种联动关系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可能重建一个解释的框架。对于推进地域文学的研究,您有何建议?

李怡:基于我所认知的“地方路径”的现代化走向,我觉得应当严肃地重新讨论地方与主流的关系问题。对地方的观察肯定会揭示某些为我们所忽略的情景,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会“补充、丰富、完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然而,这并不是地方路径思考的主要方向,因为早就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并不是以追求“越来越多”为目标的。树立一个时代所理解的文学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呈现才是一部有意义的文学史的远大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谓的地方路径不能简单归结为作家基于地方的一般意义的书写路径。从本质上说,更值得深入讨论的是作家在地方体验的背景上提出的建构现代中国的书写路径,他们各自有特色,最后才形成了一个有整体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也正因为有特色,所以不是所有的地方作家都值得或者说有必要进入文学史记载,在这个层面上,地方路径考察下的文学叙述是一种有标准、有删选的文学史,绝不会是更多的地方文学现象的堆积和拼凑。

地方路径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不是为了追求各地文学的“大全”,而是重新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之路的深层规律,是全新视野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而不是四川文学史、湖南文学史、江苏文学史、浙江文学史等等。地方路径视野考察的有效性也并不来自它如何包容、打捞起了鲜为人知的地方材料,而是说它能够透过独特的地方材料,超地方的材料发现“中国问题”。其实,地方路径考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悉地方的文献,还需要有深入的地方文学体验,同样更不是一位有着地方自恋情结的“冬烘”,不是地方秘史的炫耀者。合格的地方路径研究者应该怀揣地方、极目世界,解决的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大问题、根本问题,是真正的心怀“国之大者”,这才能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助力。

地域文学批评群体的实践经验和批评史价值

□曹刚

70多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呈现了多元与蓬勃发展的态势,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诸多学者对当代文学史的思考,如洪子诚、程光炜、陈思和等学者先后提倡的“重返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等。他们的努力提供了重新认识和思考当代文学的多种角度,体现了学界对重新界定和解释当代文学发展历史,并用文学研究的学术逻辑梳理文学流派、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以期最终实现被当前学术史和教育史所共同认可的学术愿景。

但作为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与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枢纽,当代文学批评史却并没有产生足够多元的理论著述。文学批评所提供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感性阅读经验和文学审美,经过批评的感性提炼与审美评价最终形成批评史的脉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才最为可靠。这一学术研究的空隙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2018年3月吴俊的12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出版,以编年形式著录1949年—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各类文献资料、海内外的批评史料及相关资料,这部书可谓以“史著体例”,力求把当代文学批评史,建立在稳固牢靠的史料基础上。另一部是2019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丛书之一、程光炜所著的《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该书对浩繁的当代小说批评发展史进行了纵向的梳理,从重绘时代地图(1949—1976)、历史的漩涡(1977—1991)、修复中的前行(1992—2018)三个阶段展开论述。该书在构建整体框架中,创见性地提出从“解放区批评圈”“北京批评圈”“上海批评圈”“学院派批评圈”来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历史现场。

从批评群体角度深入当代小说批评史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批评家在面对重要文学现象时所提出的重要批评观点和批评实践加以整理,总结出批评群体所具有的批评特征,但同时又尊重群体内部批评家的多元性。这一独特性的介入批评史写作的方式,避免了使著者和读者掉进浩繁卷帙的当代文学批评表象,真正厘清了当代文学发生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并且力求对不同批评群体所产生的文学史贡献和不足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述。

在程光炜正式提出从“解放区批评圈”“北京批评圈”“上海批评圈”等批评群体角度介入批评史之前,翻看相关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也可以发现不同

地域文学批评群体称谓已经流行一时。这其中就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以及新近提出的诸如“鄂派批评”“陕派批评”等批评家群体。这些地域批评群体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学派口号,其文学主张、文学立场和追求并没有趋向一致性。它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换位思考,起着凝聚批评力量、增强文学批评的地域色彩的作用。

考察这些以不同地域命名的批评家群体,大致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批评家群体多为同一籍贯,或同在某地域参与过有影响力的具体文学批评实践,有相关的文学批评阵地,对于重要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层面的判断和回应,并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以“闽派批评”为例,其主要成员有:谢冕、张炯、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潘旭涛、孙绍振、南帆等。其中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在80年代初曾为“朦胧诗”辩护,并撰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提出“朦胧诗”写作背后的美学原则的改变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变迁的观点。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获得文学史的认可,这种“崛起”原则的提出,已经成为认识“朦胧诗”的一个关键性理论话题,后来王光明、陈众议等闽籍批评家继续在新诗方面的探索也都得益于他们开辟性的贡献。另外,他们还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提倡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科学主义角度解读文学作品,这也可以看作1990年代以来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说等批评方法的科学主义转向的前奏。

“粤派批评”的主要成员有:杨义、洪子诚、温儒敏、黄子平、陈平原、饶芃子、黄树森、蒋述卓、林贤治、程文开、王晋民等。由于其地理位置空间特征,他们较早开展对港澳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通过《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粤海风》《华文文学》等相关文化阵地,在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形成一系列相关成果,主要有:饶芃子的《比较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王晋民主编的《台湾当代文学史》、王剑峰的《香港文学史》、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等。2015年“闽派批评”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后又推出“闽派批评新锐丛书”;2018年“粤派批评与中国当代文艺”研讨会在京举行,“粤派评论”丛书50册将于近年完稿出版。这些文

学地理学空间化特征的高度关注。

包括新近提出的“鄂派批评”“陕派批评”,都显示出对于当代中国文艺70多年的地域批评及其相关优秀经验的谱系学梳理。以陕西地域文学批评群体“笔耕组”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学批评实践为例,它的成立对于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起步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成员主要包括:胡采、王愚、肖云儒、蒙万夫、刘建军、畅广元、李星、费秉勋、姚虹、薛瑞生、陈贤仲、李健民、胡义成、文致和等人。“笔耕组”多位成员在回顾所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对新时期陕西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和价值时,都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1978年以后,陕西作家发表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得到了“笔耕组”成员的及时关注与评论。

陕西当时的中青年作家包括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伸、京夫等都得到过文学组员的追踪式批评,成员各自围绕一两个自己感兴趣的作家重点关注,在报纸杂志上撰写评论文章,引起了读者和全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产生了诸如刘建军、费秉勋的贾平凹研究,蒙万夫、畅广元的陈忠实研究,李星、王愚等人的路遥研究等。这些批评家通过与作家的日常交流、创作访谈、研讨会讨论、追踪式撰写批评文章,忠实于文本、仔细辨析其创作历程中的优劣得失和创新新变,向读者和作者作出准确的作品解读与反馈,扩大了作家的影响。

回顾这些地域文学批评群体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在关注地域文学作家的创作、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兴起方面,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从文学观察的在场感和实践性而言,地域性批评家可能更早地接触了文学现象的发生,并可能最早引起了读者和学界的注意。第二,对地域批评群体参与的具体批评实践和经验作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对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支撑与补充作用。第三,地域批评群体所形成的学术谱系追溯对于赓续地域文学批评的优秀历史传统、还原文学发生的时代语境、突显地域批评特色具有传承意义。中国批评话语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本土批评实践的具体经验。第四,地域批评群体具有实践在先、命名在后的特征,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学术地域共同体的独立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因而也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当代乡土小说叙事研究(2016J039)阶段性研究成果】

区域文化与文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之一。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便是其标志性的成果,此后,各种专题性的区域文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充分展示了这一领域的辽阔。

总体来说,基于地方视域的现代文学研究,往往是为了补缺被整体性叙述遗漏的地方传统,“地方色彩”“地域形象”“地方风土人情”等,自然就成了大家的聚焦点。正如有学者所言,“它虽然以‘区域’命名,却实际以‘地域文学’的精神流变为魂,以挖掘区域当中的地域精神的流变为主体”。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代表作之一,《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很好地诠释了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地域文学特色,其中所提炼和总结的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意象和概念,诸如“川妹子”“回水沱”“实力派”“袍哥”“展言子”“茶馆”“摆龙门阵”“川味”等,依然被后来从事巴蜀地域文化研究的学人所广泛采用。不过,和该套丛书的其他著述一样,和当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的整体氛围一样,这样的研究,大体上仍是1980年代“走向世界”思潮的延续。作者对四川盆地意识的反思和走出夔门渴望的阐发,与其说是四川现代作家的某些表征,毋宁说是学者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心路历程。

的确,过去我们有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生,常常依循“冲击—回应”模式,即西方的影响和冲击,新观念在得风气之先的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形成,继而波及影响到其他城市,再逐步下沉到更小的“地方”。其实,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也遵循同样的影响模式,北京、上海占据了话语资源,上演着文学研究的“双城记”,引领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潮。不过,关于巴蜀地域空间和现代文学关系的后续研究中,学者通过很多的文学史实发现,新文化和新文学从中心到地方传播方式未必靠得住。例如,新文化运动已经发生10年了,巴蜀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还不知道新诗”,新文学,连白话文也还被视为异端,四川能够买到《新青年》的只有成都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又例如,李劫人的《游园会》很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白话小说,它发表于1912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整整早6年。再如,胡适创作白话新诗的时候,四川的叶伯和业已创办《草堂》杂志,开始尝试创作白话新诗了。因此,四川的新文化新文学有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绝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启蒙火星的进溅,也不是北京上海模式的简单重复。正是基于这些考察和发现,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这一命题,所要反思的正是既往区域研究的“冲击—回应”模式,所要探求的则是“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性,呈现出与既往不同的研究思路。

该命题提出之后,有关地方路径的研究开始热起来,《当代文坛》也创设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专栏。检视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大家仍着力在一些大的文化区域,甚至是行政区域,如江南、华南、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晋察冀、绥远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区域,或者如四川、贵州、青海、安徽、内蒙古等行政区域。此外,也有不少学人沿用成都路经的方式,主要着眼于一些大城市,如昆明、武汉等。也正如这一栏目开设时所构想的那样,“中国的文学不仅可以在成都发现,也可以在广州、重庆、哈尔滨、长沙、西安、香港等许许多多的地方‘发现’。有学者认为,“文学中国”也存在对各地论功行赏、排座次的问题。个别城市或区域,因与中央权力、革命历史或党派政治的特殊关系,在文学史的表述中,将‘地方’升格为‘国家’层面的空间,如北京、南京、重庆、延安等。”很显然,比省级都市更下沉的“地方”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基层的“地方路径”还没有被纳入到“文学中国”的范畴,毕竟,“乡土中国”才是“文学中国”的依托所在。不难看出,大多数研究者还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区域文化文学研究的范式,或者说,“地方路径”中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界定。当然,这并非每一个无限细化下去的“基层”都可以作为通达现代中国的“地方路径”,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一个个村落和庙宇无休止的打捞,碎片化倾向和功能性重复,已为前车之鉴。

笔者最近就尝试以地方北碚为例,探讨北碚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北碚的确是一个非常恰切的“地方”,一个可以发现和更好理解“现代中国”的“地方”,卢作孚开始建设北碚,既立足于地方,又着眼于中国。北碚,原本是土匪出没的江巴暨合四县交界的偏僻之地,卢作孚于1927年起开始推动四川嘉陵三峡的乡村运动建设实验,这既是地方建设的启动,更是在地方实验现代中国的开始:“在这一个乡村里为中华民国作小小的实验,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短短几年之后,当时报纸就有“四川之模范镇北碚场”的说法,甚至有评选“全中国有三大干净地方”“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是北碚”。全面抗战时期,陶行知来到北碚后就称赞说,“来碚一周所见,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美国社会学教授孙思山(T·H·Sun)也赞誉北碚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

北碚自主走向现代化的实验之路,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层面,还在于文化和文艺上的探索,而地方报纸《嘉陵江》(日报),既是北碚走向现代化的见证,也保留了诸多北碚近现代文艺嬗变的重要史料。发刊词《介绍《嘉陵江》》中写道:“各位朋友,替你们介绍,这便是《嘉陵江》。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个小朋友——两天出版一次的一个小报……这个《嘉陵江》,身体虽小,肚皮却大,大到可以把五洲吞了。各位朋友,不要见笑,不信试看一看,简直可以从这个小《嘉陵江》里,看穿四川,中国乃至五大洲——全世界。”作为“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的嘉陵江,极具地方色彩,这也是报纸得名的初衷,预示着立足地方北碚的定位;但另一方面,嘉陵江本身绝对不是封闭的象征,它汇入长江流向上海和世界,预示着北碚也要经由《嘉陵江》通达中国和世界。

这份发刊词关于“小”与“大”的辨析尤为精彩,显然是地方与国家的隐喻表达,小小《嘉陵江》可看中国的定位,无疑表明,该报是理解“地方北碚”和“现代中国”如何互动的最好材料,而报纸上的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理解文学中国的重要案例。例如,《嘉陵江》留存的诸多“金钱板词”“新剧”“演讲”“报告”“故事”“笑话”等,诉诸声音的传播、强调听觉的反响,用文字阅读的标准很难给予它们恰切的定位,用上海、北京,甚至是成都的文学发展路径,都无法诠释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有声的文艺是北碚地区实现社会动员与国家观念形塑的重要途径,是“有声的中国”之典型个案,这也是北碚这一“地方路径”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并非是要凸显“地方北碚”经验的特殊性,恰恰相反,是想通过北碚这样的地方路径的发掘,探求它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为普遍的共性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太过强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城市经验,如上海、北京、广州等诸多沿海城市,中国现代文学也多注重大城市,但其实,这些大城市的经验未必在其他地方都有效。周宪考察现代性概念时,曾借鉴本雅明的“星丛”说,他提出“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概念,实际上贯彻了‘家族相似’或‘星丛’的观念”。考古学家苏秉琦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时,提出了“满天星斗说”,其实,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亦可谓“星丛”和“满天星斗”模式,五四之后,知识精英阶层下乡,相继在各个地方展开乡建实验,有成百上千的乡建团体和乡建试验基地。北碚只是百千中的一个,我想,寻找类似北碚这样更为“下沉”的地方,不断总结其现代化的经验,探寻其文艺现代化的路径,呈现中国文学发展的主体性,由此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可能。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地方』的下沉与『文学中国』探究的可能

□张武军